

·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

新时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和实践路径

徐政¹, 郑霖豪², 程梦瑶³

(1.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江苏南京 210009; 2. 福建投资集团闽投研究院, 福建福州 350003;
3.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福建福州 350108)

摘要: 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已经进入攻坚阶段, 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的发展阶段, 民营经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具有核心作用, 而制度保障、创新驱动、要素配置和开放协同则是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进入新时期, 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国际环境趋紧、产业升级承压、政策执行梗阻、内需动能减弱等挑战。为了有效促进民营经济在新时期的高质量发展, 需要通过破除隐性壁垒激发市场活力、构建自主可控创新生态体系、拓展国内外市场增长空间、破解资金人才数据瓶颈、抢占全球竞争战略高地等得力措施, 确保民营经济成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的策源地、中国式现代化的践行者。

关键词: 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 新发展格局; 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图分类号: F3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094(2025)04-0036-12

“56789”常用来概括我国民营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即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民营经济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位置。2018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深刻指出: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一重要论断从根本上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政治地位和发展逻辑^[1]。2022年,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强心剂。2024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2025年2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 “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2025年5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强调, “以制度创新赋能企业发展, 进一步释放微观主体活力, 培育更富活力、更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科应用精品工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专项)“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内涵及因地制宜发展路径研究”(STA-04)。

作者简介: 徐政,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 经济学博士,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生态环境厅基地特约研究员, 河北省重点高端智库“河北省公共政策评估研究中心”研究员。

通信作者: 郑霖豪, 福建投资集团闽投研究院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 国民经济。

程梦瑶,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 数字经济、能源经济。

引文格式: 徐政, 郑霖豪, 程梦瑶. 新时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和实践路径[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7(04): 36-47.

具韧性、更有竞争力的现代企业”,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扎实的政策基础。

当前,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正处于攻坚阶段,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大理论创新则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3]。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十大任务之首,明确要求“推动民营企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揭示了民营经济在技术革命、产业变革中的主体作用,标志着党中央对民营经济的战略定位从“重要组成部分”向“核心驱动力”的跃升。在此背景下,笔者将立足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外环境,积极探索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认真思考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构想,为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一、新时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

高质量发展强调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增长。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动力。民营经济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经济形态,其创新活力与资源配置效率对我国突破“卡脖子”技术、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一) 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民营经济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动力,根植于其与市场机制的高度适配性和对超大规模市场潜能的深度激活能力。民营经济通过自发遵循比较优势原则,能够以市场信号为引导,通过市场信号的灵敏响应与资源配置的动态调适,在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构建起双向牵引的循环机制^[4]。这种供需协同不仅突破了传统经济循环中“供给创造需求”的单向逻辑,更通过激发消费升级与产业转型的共振效应推动经济系统向更高层次的均衡跃迁。

在国内,民营企业凭借占全国92%以上的企业数量、贡献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创新投入与市场需求的正反馈循环,持续释放着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动能。在国外,民营企业依托占53.5%的外贸份额和占55%的出口比重,构建起连接国内国际市场的立体网络。这种“创新激发市场、市场反哺创新”的螺旋式上升机制,使得民营企业成为打通“双循环”堵点的关键枢纽,形成了“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产业能级”的良性互动。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语境下,民营经济的战略价值体现为对“双循环”互促机制的深度嵌入。民营经济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螺旋式演进,既能在国内大循环中强化产业链韧性,又能在国际循环中突破技术封锁与标准垄断。换言之,其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主创新模式,不仅打破了传统技术引进的路径依赖,更通过反向创新机制将中国市场需求特征转化为全球技术迭代的方向标,重构国际分工中的价值分配格局。例如,海尔在全球建立的“10+N”研发体系,通过整合GE家电、斐雪派克等品牌,形成了“本土化研发→全球化运营”生态模式,重构了家电行业全球分工格局。总之,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注入了可持续的内生动力,而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市场机制与制度优势融合的实践样本。

(二) 加快产业转型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配置和产业深度变革,形成新型

生产力形态,而民营经济凭借其市场化基因和创新活力,天然成为承载这一变革的主体。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民营企业通过“创新—市场—再创新”的正反馈循环,不仅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跃迁,更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构建起技术壁垒和产业生态优势^[5]。熊彼特创新理论所强调的“创造性破坏”在民营经济中表现得尤为显著。民营经济灵活的组织结构和风险承担能力使其能够快速响应技术迭代,在半导体设备国产化、鸿蒙系统生态构建等领域实现从技术追赶向标准制定的跨越。当然,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化营商环境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协同推进。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以下简称《民营经济促进法》)通过确立竞争中性和公共数据开放制度,将“两个毫不动摇”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实践,降低了民营企业在技术研发、市场准入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稳定预期。

民营经济对产业转型的推动作用还体现在其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能力上。民营企业通过反向创新机制,可以将国内市场需求特征转化为全球技术标准。例如,我国民营企业在储能技术、数字贸易等领域的技术突破,不仅带动了其产业升级、增强了国内产业链韧性,而且提升了国际分工话语权、推动了国际输出力度。又如,三一重工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不仅实现了产能提升和成本降低,而且其智能制造标准被德国、印度工厂采用,推动全球工程机械行业从规模竞争转向效率竞争。总之,这种内外循环的有机衔接使民营经济成为连接国内统一大市场与全球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民营企业通过跨境电商、海外研发中心等模式,实现了要素跨境优化配置,推动着产业体系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创造转型。当前,民营经济通过数智化赋能,在打破信息孤岛、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催生了柔性制造、共享经济等新业态,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注入动能。

(三) 促进充分就业和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保障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促进共同富裕与社会稳定的基础保障,其内在逻辑深植于市场机制与制度创新的协同效应^[6]。民营经济通过优化生产力要素配置实现财富创造的乘数效应,在初次分配中形成效率提升与普惠共享的共生机制。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深入推进,民营经济凭借独特的运行逻辑,可以构建起多维度的就业支撑体系,核心机理就在于其灵活的经营机制与市场需求的演变深度契合:一方面,民营经济通过技术迭代的传导效应,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和新业态培育中持续释放就业增量空间;另一方面,需要依托“需求感知—资源配置—服务创新”的动态响应机制,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赛道快速形成人力资本适配通道。民营经济的就业创造能力本质上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变革的动态调适过程。当前,民营经济正经历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创造的转型,其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中形成的人力资本溢价效应,将持续推动就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技能密集型跃迁。

从共同富裕的维度观察,民营经济的战略价值体现为三次分配的有机协同。具体来说,民营经济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可以激活传导链条,在初次分配中形成效率提升与普惠共享的共生机制——技术创新以驱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种质效改进不仅能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更能够通过技能溢价带动收入增长的路径重塑分配格局,将人力资本升级转化为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在再分配环节,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推动生产要素确权,将私域效率转化为公共福利。在三次分配中,民营经济可以通过“数据要素×”行动重构公益模式,实现基础设施普惠共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东部技术+西部资源”的协同路径。

二、新时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当前,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处于关键跃升期,制度保障、创新驱动、要素配置和开放协同已经成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确保这些关键环节齐头共进、有机配合,既是应对当前逆全球化挑战的战略选择,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路径。

(一) 制度保障:法治化与市场化协同的制度创新

在新时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核心命题在于法治化与市场化的制度协同创新。这一过程本质上是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辩证重构,即法治框架的稳定性与市场机制的灵活性耦合,能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的成本。我国《民营经济促进法》通过刚性约束与柔性激励相结合的制度设计,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营经济治理范式^[7]。

一方面,法治基础的制度性重构有助于建立民营企业的发展确定性。《民营经济促进法》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两个毫不动摇”原则,将公平竞争审查、要素平等使用等抽象政策转化为可执行的权力清单。例如,该法不仅明确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而且通过法律条文消除了“玻璃门”“弹簧门”等隐性壁垒。这种法治化保障使民营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从政策期的波动状态降至稳定区间,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了稳定的预期^[8]。

另一方面,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有助于激活民营企业的内生增长动能。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需匹配制度创新。《民营经济促进法》将数据、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确权纳入法治轨道,可以推动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的要素流动机制,通过创新生态系统的法治化构建培育新质生产力。与此同时,该法通过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实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等制度,有利于形成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升级的创新闭环,推动民营企业从技术追随者转向标准制定者。例如,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就在该法的引导下,突破了西方技术封锁,实现了产业链的价值跃迁。

(二) 创新驱动:技术跃迁与产业升级的双重突破

在新时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的强大动力。实现创新驱动下技术跃迁与产业升级的深度耦合,本质上是新质生产力理论在微观经济层面的具象化实践。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民营企业的创新突破需依托“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市场化配置—制度供给适配”的三元协同机制,其战略价值在于重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实现从技术追随者向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转变。民营企业的创新优势集中体现在市场导向的应用研发领域,但新时期需突破“卡脖子”技术的瓶颈,实现基础研究与产业化的双向奔赴。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原始创新能力需通过国家战略牵引与企业主体攻关相辅相成的模式实现,以此确保基础研究突破与技术应用转化的闭环构建,推动基础研究能力和技术转化效率的提升。这一进程不仅有助于突破西方的技术封锁,还有助于将实验室成果直接转化为产业应用,以市场利润反哺科技研发,形成良性循环。

当前,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必须破解“高端产业低端化”悖论,将智能制造深度嵌入传统产业的变革^[9]。这种“人工智能+”的改造路径,可以推动制造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提升。需要说明的是,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还有助于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优化的双重目标。今天,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倒逼着民营企业必须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而其突破点就在于将环境外部性内化为竞争优势,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生态的协同发展。民营经济创新驱动面临的关键

问题在于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制约技术跃迁高度,要素流动壁垒限制产业升级广度,需通过《民营经济促进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精准落地,构建“基础研究税收抵扣+应用转化风险共担”的政策体系,推动民营企业从产业链末端的价值实现者转向创新链源头的价值创造者,最终实现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历史性交汇。

(三) 要素配置: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结构性改革

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结构性改革重构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机制,是新时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也就是说,以要素配置的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突破口,重点围绕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进行市场化重构,可以破解传统要素错配与新兴要素壁垒的双重约束,构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协同机制^[10]。具体而言,土地要素市场化需突破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性约束,破除城乡二元壁垒,释放空间红利,在降低工业用地成本的同时提升土地集约化利用效率;资本要素改革需构建复合型金融支持体系,打破传统信贷依赖,使资本要素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创新需求;劳动力要素需通过户籍松绑,重塑人力资本配置,跨越“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技术要素市场化需破解“基础研究—应用转化”的断层困境,激发创新主体活力,使民营企业成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核心策源地。

我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确立的“要素平等权”制度,通过消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建立争议快速响应机制,为要素市场化提供了法治保障^[11]。例如,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全面实施,使民营企业在数据使用、技术采购等领域获得了平等地位。又如,法治化营商环境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为要素高效配置提供了确定性支撑。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需以动态评估机制优化全链条制度体系,通过土地城乡流转、资本精准滴灌、人力自由流动和技术产权激励等多重路径的协同推进,实现生产要素的价值倍增。在改革中,需直面传统要素错配与新兴要素壁垒的双重挑战,以制度创新驱动要素重组与效率跃升,推动民营经济从要素依赖型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选择^[12]。

(四) 开放协同:双循环格局下的全球价值链重塑

今天的世界格局复杂多变,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需以双循环格局下的全球价值链重塑为方向,结合逆全球化加速与技术主权博弈加剧的时代特征,利用民营企业创新活力强但全球资源整合能力不足的自身特点,努力构建有效共振的开放协同机制。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已进入规则博弈深水区,民营企业应以制度创新破除壁垒、技术突围重构优势、生态协同分散风险,实现从被动融入到主动塑造的跃迁^[13]。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民营企业面临的核心矛盾是传统国际分工体系解构与新兴技术标准壁垒形成的双重挑战。在全球价值链理论看来,后发国家企业需突破链式依附的路径依赖,通过制度性开放重塑要素配置规则。当前,欧美国家主导的友岸外包政策和碳边境调节机制构成了新的制度壁垒,民营企业必须通过制度性嵌入实现规则对接,通过制度创新重构全球要素配置的规则适配性。

全球价值链重塑的核心动力来源于技术代差突破与创新链主导权争夺。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认为,民营企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从应用创新跟随者转向基础创新引领者,破解“基础研究—应用转化”的断层困境。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重构“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政府主导基础研究平台建设,民营企业聚焦共性技术攻关,形成“国有资本搭台—民间资本唱戏”的混合创

新模式。例如,通过建设“国家实验室+民营科技企业”联合体,将分散的研发资源整合为系统性攻关能力,推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技术的颠覆性突破。这种创新生态的本质是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的再升级,即通过技术跃迁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形态,使民营企业从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当前,面对全球产业链的“短链化”趋势,民营企业还需从地理集中依赖转向区域价值链的韧性构建^[14]。也就是说,民营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应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形成“国内大市场辐射—东盟非洲双轴心联动—欧美技术反哺”的三层嵌套结构。首先,深化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产业集群协同,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降低内部交易成本,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其次,依托RCEP的制度性框架,在东南亚布局建设“技术梯度转移+产能合作共建”节点,将中国技术标准与当地资源禀赋深度融合。最后,通过欧盟研发中心反向技术溢出,实现绿色技术迭代与高端人才虹吸。这种生态协同机制的本质,实际上是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模型的升级版,即通过区域价值链的多中心化布局对冲单极风险,同时借助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形成“虹吸—辐射”的双向循环动力。

三、新时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挑战

在新时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多维度的现实挑战,既有国际环境的系统性挤压,又有国内结构性矛盾的可能深化,还存在制度性障碍与技术瓶颈的叠加效应。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共同构成了民营经济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复杂生态。

(一) 国际环境趋紧:外需收缩与技术压制

当前,全球经贸格局加速重构,民营企业面临的外需收缩与技术壁垒高企呈现出结构性深化特征,更体现为规则博弈叠加产业链重组的系统性风险。首先,外需结构性萎缩与市场替代压力并存。民营企业之前主要应对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中断,而新时期面临的则是区域化贸易体系固化导致的需求收缩,尤其是美国推动的“友岸外包”政策使东盟、墨西哥等替代性制造中心加速崛起。这种转变倒逼企业从低成本出口依赖转向差异化市场深耕,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制于路径锁定效应,难以在短期内完成产品升级与渠道重构。其次,欧美技术封锁从产品断供向标准排斥升级。相较于此前华为等企业遭遇的芯片断供,当前技术壁垒已演变为标准体系排斥。这种规则性壁垒不仅压缩了技术转化空间,还通过“标准—市场”绑定机制削弱了我国产业链的主导权,形成“技术突围却难获市场溢价”的困局。此外,绿色壁垒与碳成本内部化也双重挤压着民营企业的合规体系和利润空间。进入新时期以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全面实施,标志着其环境规制已经从生产端约束转向全链条碳成本内部化。在此背景下,与先前末端治污的环保压力不同,我国钢铁、铝业等出口型民企需承担额外碳关税。这种内外夹击的态势迫使企业必须在绿色技术升级与产能收缩之间作出抉择,而中小民营企业受制于资金与技术积累不足,往往陷入“不转型等死,转型是找死”的被动局面。最后,产业链短链化与区域化替代风险也是民营企业面临的外部挑战。当前,全球价值链正从长链分工转向区域闭环,跨国企业通过“中国+N”布局分散供应链风险。这种重构使民营企业面临双重脱钩,即:既难以深度嵌入欧美高端产业链,又在新兴市场遭遇本土企业竞争。与此前依靠政策对冲的应急策略不同,新时期的破局需要民营企业构建有效的应对体系和机制。要实现这一目标,十分考验企业的战略韧性和全球化治理能力。

(二) 产业升级承压:传统转型与新兴断档

民营经济的产业升级面临着传统产业路径依赖强化与新兴产业生态断层的双重挤压,与“十四五”时期以供应链修复为主的产业调整形成本质差异。当前,挑战的核心在于新旧动能转换速率失衡,既需破解传统产业“转不动”的僵局,又要应对新兴产业“接不上”的断档风险^[15]。一方面,传统产业转型陷入“效率—价值”双重陷阱。相较于以前以产能过剩为主的表层矛盾,新时期传统产业升级已触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瓶颈。当前,民营企业不仅产能利用率低,而且技术改造投资增速也走低。这种“低效运行—低质投入”的恶性循环,源于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深层障碍:中小型民企受制于数据孤岛与算法人才短缺,难以实现生产流程重构,同时重资产行业的绿色转型也面临碳成本内部化的压力。另一方面,新兴产业遭遇技术与市场的双重断层危机。以前,新兴产业主要面临的是市场培育问题,而新时期的挑战则升级为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时空错配。今天,民营企业尽管贡献了主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但其关键环节仍存在着“卡位”困境。尤其是在低空经济、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民营企业虽主导着应用开发,但在基础材料、核心算法等上游环节仍依赖进口,形成“应用繁荣—根基脆弱”的倒金字塔结构。更为严峻的是,市场的需求侧已经出现结构性分化,新能源汽车等赛道已从增量扩张转入存量博弈,迫使企业陷入技术迭代投入与市场份额保卫的两难抉择。同时,要素流动壁垒也加剧了转型断层:传统产业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大量的沉淀资产(如闲置厂房、专用设备)因产权交易机制缺失而难以盘活,最终导致转型资源错配,而新兴产业则面临数据要素流通梗阻。这种要素流动的双向阻滞,实质上是科斯定理失灵在产业升级中的具象化,即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延缓了新旧动能转换的进程。

(三) 政策执行梗阻:法治短板与隐性壁垒

当前,政策供给不足转向制度效能衰减,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构成阻碍,尤其是在法治框架与政策执行层面暴露出系统性梗阻^[16]。相较于“十四五”时期以市场准入显性壁垒为主的矛盾,当前的挑战更体现为法治化进程滞后与隐性治理惯性交织的复合困境,其背后是制度文本与执行实践的鸿沟、政策协同与要素配置的结构矛盾。法治框架与实践落差的制度性张力是政策执行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民营经济促进法》虽以立法形式确立了“两个毫不动摇”原则,但实践中的法治效能仍受制于地方治理惯性,法律刚性约束与地方自由裁量权存在着激烈博弈。例如,地方保护主义通过“竞争性磋商”“资质附加条款”等方式变相设置准入壁垒,即便法律明确禁止,仍需企业付出额外协调成本。这种制度性张力本质上反映了科层体系对市场化改革的适应性滞后,导致法治红利未能充分释放。而法律框架下仍然存在隐性壁垒,其治理惯性难以根除。当前,隐性壁垒更多嵌入于行政裁量权与认知偏见。这种治理惯性本质上是计划经济思维的残留,其导致法治化营商环境在实践中异化为合规竞赛,而非真正的公平竞争。政策协同不足加剧执行碎片化是政策执行梗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7]。相比于之前政策矛盾集中于单一领域(如融资难、税费高),新时期的梗阻更多体现为跨部门、跨周期政策的不兼容。例如,传统产业退坡政策(如阶梯电价)与新兴产业扶持政策(如研发加计扣除)缺乏衔接,导致跨界转型企业面临政策悬崖。又如,区域产业规划同质化加剧重复建设,与法治化营商环境要求的统一大市场目标背道而驰。这种政策孤岛现象削弱了民营企业的长期投资信心,迫使企业在合规成本与战略调整之间权衡,形成制度性交易成本黑洞。尤其是对于数

据、产权等新兴要素的制度性锁闭,让要素市场化改革仍然存在“最后一公里”梗阻。

(四) 内需动能减弱:消费疲软与人口约束

在新时期,民营经济面临的内需挑战已从周期性波动转向结构性疲软与人口红利消退的复合压力^[18]。相较于“十四五”时期疫情冲击导致的短期消费萎缩,目前我国的消费疲软已经从周期扰动转为结构固化,本质在于居民收入分配机制失衡与人口结构变迁的长期约束。换言之,“十四五”时期消费疲软主要表现为疫情冲击下的短期需求冻结,而当前我国国内的消费乏力则源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与预防性储蓄强化的深层矛盾。这种“高储蓄—低消费”的闭环对民营经济的冲击具有系统性和不可逆性,导致民营企业特别是消费品领域陷入供给创造需求失效的困境。因此,“十四五”时期的消费提振主要依靠短期补贴(如家电下乡、消费券),而新时期需要直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的深层矛盾。同时,当前民营经济面临的人口约束也从“十四五”期间的劳动力总量下降升级为老龄化加速与技能供需错配并存的结构性失衡。这种转变不仅压缩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空间,更对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路径提出了系统性考验^[19]:与“十四五”时期劳动力总量下降的显性压力不同,新时期的人口挑战体现为老龄化加速与技能供需错配的双重约束;与“十四五”时期通过劳务派遣缓解用工荒的短期策略不同,新时期的人口红利消失具有不可逆性,倒逼企业重构生产函数。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3.1亿,占总人口的22%。预计到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直接推高养老服务成本并挤压家庭消费空间。同时,我国制造业高级技工的缺口较大,导致智能制造转型面临设备智能化与操作低技能的断层。这种结构性矛盾使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陷入两难:劳动密集型企业难以承受自动化改造的成本,而技术密集型企业又面临人才争夺战中的资源错配。

四、新时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新时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需以制度创新破除隐性壁垒,以技术跃迁突破低端锁定,以要素重构释放增长潜能,以开放协同重塑全球位势。通过法治化保障、数智化赋能、全球化布局的系统推进,民营经济将不仅是国民经济“56789”贡献度的支撑者,更将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策源地、中国式现代化的践行者。这一进程既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度的重大考验,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替代的战略支点。

(一) 法治保障与制度创新并举,破除隐性壁垒激发活力

当前,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建设重点,已从政策修补转向制度重构,其实现路径需通过法治刚性约束与治理机制创新协同发力,破解制度空转与隐性壁垒固化的深层桎梏^[20]。相较于“十四五”时期以政策纾困为主的短期应对,当前改革更强调法治化治理能力的系统跃升与制度型开放的规则适配,其本质是通过法治框架固化改革成果,以制度创新激活要素配置效率。

一方面,法治保障要从文本规范转向效能穿透。“十四五”时期,国家主要通过修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行政法规破除显性壁垒,而新时期要实现突破,重点在于《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刚性实施。该法首次将“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法律,建立了覆盖市场准入、要素配置、权益保护的全周期治理框架。在未来的实施中,要提升法律实施效能,应通过动态监测《民营经济促进

法》实施效能(如建立民营企业法治指数),推动地方治理惯性转型。

另一方面,制度创新要聚焦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是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当前,行业领军民营企业通过制度创新构建核心竞争力,已经形成“治理现代化—创新体系化—价值长效化”的递进式发展路径,未来需要进一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对于隐性壁垒的治理,需要从运动式清理转向机制化预防,建立政策制定公平竞争审查的强制程序,确保地方政府出台产业政策同步提交竞争影响评估报告,同时将隐性壁垒治理纳入地方政绩考核。这种制度创新,不仅是对“十四五”改革成果的法治化固化,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性突破^[21]。

(二) 技术攻坚与产业链协同并重,构建自主可控创新生态

民营经济实现从技术跟随转向自主可控,需要通过核心技术突破与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协同共振,破解“卡脖子”风险与孤岛式创新的深层梗阻。相较于“十四五”时期以供应链修复为主的被动调整,当前民营经济发展更强调全链条创新生态的系统重构与全球价值链位势的主动跃升,其本质是通过技术攻坚与产业协同的双轮驱动,构建出内生型创新体系。

一方面,技术攻坚要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攻关。“十四五”时期的技术攻坚主要聚焦于关键领域替代(如芯片制造),而新时期的突破在于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深度耦合。具体来说,应以法律法规明确支持民营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通过“揭榜挂帅”机制加速技术转化;通过基础研究能力强化和共性技术平台共建,突破“十四五”时期产学研脱节的困境,实现从技术孤岛到创新网络的跃迁。

另一方面,产业链协同要从被动配套转向生态重构。相较于之前注重供应链的稳定性,当前的产业链协同应强调价值链主导权的争夺。具体来说,通过产业间的纵横整合和横向联通,不断提升产业链的韧性;通过技术标准输出,重构全球分工秩序。同时,加快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动生产流程优化,积极促进数据要素驱动的产业范式重构,将数据要素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核心生产资料,推动民营经济从效率竞争转向生态竞争^[22]。

(三) 双循环布局与资源优化并行,拓展内外市场增长空间

新时期实现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国内大循环的精细化深耕与国际循环的规则化突破方面双向发力,破解市场分割与要素错配的深层矛盾。相较于“十四五”时期以应急性供应链修复为主的被动调整,当前民营经济发展应强调要素配置的市场化升级与全球价值链位势的战略性跃迁,通过内外市场的结构性优化,构建自主可控的开放型经济体系^[23]。

一方面,主动优化国内国际双循环布局。国内循环需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深耕。“十四五”时期的内循环建设侧重扩大内需规模(如消费券发放、基建投资),新时期的突破则在于需求侧精准适配与供给侧结构性升级的深度耦合。国际循环要从商品输出升级为规则输出。相较于以往以货物贸易为主的国际化,民营经济在新时期要注重技术标准与治理规则的话语权争夺,通过科技突破和标准体系构建的组合拳,取得技术标准的主导权,尤其是要注意将绿色技术优势转化为规则话语权。这种改革和发展路径,既是对双循环战略的纵深突破,更是中国经济从体量优势向规则优势转型的关键跨越。此外,还必须重视推动服务贸易模式创新,通过技术授权模式输出标准,形成“产能+技术”双出海格局。

另一方面,推动要素配置从传统要素优化转向新型要素激活。这一工作的核心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数据、知识产权等新型要素的制度性解放,打破数据要素流通壁垒,将数据资产

转化为创新动能,突破传统要素依赖^[24]。具体来说,可以通过设立跨境数据流动特区,破解数据要素跨境流通的制度障碍,通过内外规则衔接与要素重组,构建更具韧性的开放型创新体系^[25]。

(四) 要素改革与多元支撑并进,破解资金人才数据瓶颈

当前,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已从要素供给不足转向要素配置失衡,破解路径之一在于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性突破与多元支撑体系的协同赋能,全力突破资金、人才、数据三大瓶颈的深层桎梏^[26]。相较于“十四五”时期以单项要素优化为主的局部调整,当前民营经济改革更强调要素耦合效应的系统性释放与制度型支撑能力的范式跃迁,通过要素改革与支撑体系的协同共振,构建更具韧性的发展生态。

对于资金要素,要从信贷输血转向资本造血。“十四五”时期主要通过普惠金融定向降准等政策缓解民营经济发展的融资难问题,而新时期的突破在于构建全链条的资本支撑体系。也就是说,通过股权融资机制创新和股权融资机制创新,将应收账款、订单数据等软资产转化为可质押标的,从而突破依赖抵押物融资的路径锁定,实现从信用输血到价值造血的跃迁。

对于人才要素,要从数量补充转向结构适配。一方面,建立“引育留用”全周期治理体系,强化人才政策支撑,为优化民营经济发展营商环境注入人才动能。另一方面,探索设立企业引才特设岗,创新企业人才分类定级评定方式,进一步提升企业重要岗位的引才留才吸引力,全力破解企业用才水土不服难题^[27]。

对于数据要素,要实现数据价值链的深度重构。在这里,重点是进一步明确民营企业的公共数据开发权,使数据要素从辅助资源升级为核心生产资料,解决之前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数据孤岛化问题,从单项要素优化转向多重生产要素耦合效应释放,构建要素协同增值的化学反应。

(五) 新兴产业与绿色转型并驱,抢占全球竞争战略高地

新时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实现制度创新、生态协同与全球规则重构的系统性跃迁。相较于“十四五”时期以技术替代和产能扩张为主的线性发展模式,当前民营经济改革应强调制度型创新驱动、全要素协同赋能与国际规则主导权争夺的深度融合,在制度供给、系统协同与规则输出方面实现三维突破,构建中国民营经济的全球竞争新范式。

一方面,以法治化手段固化制度改革成果。我国以前的绿色转型更多是通过财税优惠、专项补贴等短期政策予以激励和推进,而《民营经济促进法》首次将“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绿色技术标准制定”写入法条,明确了环保绩效A级企业的税收优惠与碳排放权交易的规则。这种制度突破不仅为民营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稳定的预期,更通过数据要素开发权确权、碳资产资本化等制度设计,将绿色投入从成本项转化为可量化的资产。换言之,当前的改革通过法律刚性约束与市场化机制的有机结合,可以助力民营企业的绿色转型实现从被动合规向主动增值的范式升级^[28]。

另一方面,构建“法治保障—要素协同—规则输出”闭环体系。虽然这方面需要开展的工作极多,但是就当前而言,可以先重点抓好以下工作: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配套细则(如数据资产会计准则),激活绿色技术资本化潜能;依托RCEP机制推动区域标准互认,将中国技术优势转化为国际规则筹码;建立民营企业与国际组织直接对话机制,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做好这些事情,既是对既有改革成果的集成突破,又是中国经济从追赶型增长向引领型发展转型的关键跨越。

五、结语

新时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命题。在“十四五”与“十五五”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上,探索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有助于构建中国情境下的民营经济发展范式,为破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梗阻提供实践指导。笔者在认识民营经济的战略作用、揭示民营经济发展过程的关键环节、剖析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深层挑战的基础上,探索了新时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创新—开放—要素—产业”五维协同实践路径。笔者认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生产关系适配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动态调适过程,只有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打破资源错配、市场准入壁垒和产业链地位弱势等深层梗阻,通过以数据要素高效配置、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来重构新型生产关系,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方能在全产业链重构与国内经济转型的复杂变局中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根基。

当然,本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例如,笔者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适配效果的精细化评估、要素配置效率的多维度量化和全球治理参与的深度机制等方面尚未涉及,期待未来有学者能对此进一步深入探究。

参考文献

- [1] 罗永宽,杨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重要论述的理论构建与创新[J]. 广东社会科学,2025(03):5-18,285.
- [2] 任继球,魏丽,刘振中,韩晓.“十五五”时期推动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发展环境、问题瓶颈与路径任务[J]. 经济学家,2025(02):96-105.
- [3] 曾铮,刘方.“十五五”时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研究[J]. 改革,2024(08):23-34.
- [4] 徐政,郑霖豪.破解“内卷式”竞争视角下新质生产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依据与战略构想[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9(02):48-58.
- [5] 杨凡.科技自立自强演进的历程、特征及经验[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04):90-98.
- [6] 张文武.民营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理论澄清、逻辑机制与现实路径[J]. 社会科学研究,2024(03):69-75.
- [7] 王利明.民营经济促进法: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权益保障法[J]. 学术探索,2025(01):116-126.
- [8] 刘俊海.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特征——以公司法律制度为中心[J]. 行政管理改革,2024(12):59-69.
- [9] 刘现伟,文丰安.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点与策略[J]. 改革,2018(09):5-14.
- [10] 黄群慧.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J]. 经济研究,2021,56(04):4-23.
- [11] 陈云良,朱文辉.民营经济发展的四大现实问题及其法治纾解[J]. 探索与争鸣,2024(12):162-170,227.
- [12] 李正图,朱秋,米晋宏.论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J]. 上海经济研究,2023(03):19-26.
- [13] 卢伟,聂新伟.“十五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和趋势展望[J]. 财经智库,2024,9(03):5-26,138-139.
- [14] 童有好.营造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的若干问题及对策[J]. 经济纵横,2019(04):52-58.
- [15] 任晓猛,钱滔,潘士远,蒋海威.新时代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思路与举措[J]. 管理世界,2022,38(08):40-54.
- [16] 王欣.新时代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制度演进、现实刻画和未来进路[J]. 产业经济评论,2022(04):5-25.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黄群慧.“十四五”时期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趋势及优化政策研究[J]. 经济学动态,2020(03):3-21.

- [18] 薛熠,王韡,徐朝阳.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收入不平等及其宏观经济效应[J].经济研究,2023,58(07):52-68.
- [19] 邵红梅,丁洪宇,李通屏,段平忠.人口老龄化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03):37-52.
- [20] 江必新,曹梦娇.论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及其法治保障[J].广东社会科学,2024(03):261-270.
- [21] 郭敬生.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价值、遵循、机遇和路径[J].经济问题,2019(03):8-16.
- [22] 刘瑞,郑霖豪,罗洁.数字技术赋能五年规划管理:理论逻辑和实践意义[J].上海经济研究,2023(07):64-72.
- [23] 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J].管理世界,2020,36(12):1-13.
- [24] 戴双兴.数据要素:主要特征、推动效应及发展路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06):171-177.
- [25] 韩先锋,勾亚楠,肖远飞,李勃昕.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制度创新的力量:政策协同赋能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4(11):62-80.
- [26] 徐政,程梦瑶,郑霖豪.美加征关税背景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3.(2025-04-14)[2025-06-26].<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50414.1006.002.html>.
- [27] 孙久文,虎琳.“十五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问题与实践[J].江西社会科学,2024,44(07):39-52.
- [28] 肖旭,戚聿东.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维度与理论逻辑[J].改革,2019(08):61-70.

责任编辑:李桂东

编辑部网址:<http://sk.swpuxb.com>

Key Factor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conomy in the New Era

XU Zheng¹, ZHENG Linhao², CHENG Mengyao³

(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J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Nanjing Jiangsu, 210009, China;

2. Mintou Research Institute, Fujian Investment Group, Fuzhou Fujian, 350003, China;

3.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Fuji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Fuzhou Fujian, 350108, China)

Abstract: When China is at the critical stage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conomy holds significant strategic importance.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private economy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whil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innovation drive, factor allocation and open coordination are the key link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conomy. In the new era,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is confronted with multiple challenges, including a tighten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pressure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obstacle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weakening of domestic demand momentum.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conomy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stimulate market vitality by breaking down hidden barriers,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and controllable innovation ecosystem, expanding the growth space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breaking the bottleneck of capital and talent data, and by seizing the strategic highland of global competition so as to ensure that private economy becomes the source of China's new productivity and the practitioner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private econom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emerging sector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